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文章编号]1001-5558(2023)01-0015-14

● 杨须爱

摘要：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渊源；政治化效应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230214.006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也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1] 283}。科学知识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概念的中国化研究”（编号：19AMZ001），中央民族大学2022年自主科研青年学术团队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创性研究”（编号：2022QNYL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2-09-01

[作者简介] 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西北民族研究

2023年第1期(总第118期)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2023.No.1(Total No.118)

和理论的创新往往是从提出新概念开始的,尤其是社会科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而且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人们提出的社会科学新概念很多,但只有极少数的概念能成为特定社会或时代的基本概念。一个新概念只有在长期的学术、社会话语变迁过程中沉淀下来,被公众广泛接受,尤其是被政治力量接受和运用于社会—政治动员之中,演变为高度抽象的观念信条,才能成为时代的基本概念。按照德国概念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学说,一个只有经历了“时代化”“平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社会科学新概念,才能成为特定社会或时代的基本概念^[2] 225-230^[3] 49-54。就此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可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群中的一个“新宠儿”。这种结果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理论必然性。笔者曾撰文分析了此概念提出和演化为新时代的一个基本概念的历史过程^[4],但受篇幅限制,未对其提出与演化的主要理论渊源、政治化的必然性及其理论与实践效应进行分析。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有利于运用这一概念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

一、夏鼐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

从目前出版的史料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由新中国考古学家夏鼐1962年提出^①。是年,他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依据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成果阐释汉族和各民族的族源、联系时讲:“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5]其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和演化,这个新概念被中国社会科学界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广泛接受和运用,进而逐渐被社会大众熟知,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并于2014年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话语之中,最终成为特定时代的一个基本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采用和发展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2021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总纲。以上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政两界不懈研究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思想轨迹。

从结构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组成。“中华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已被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所熟知,但是,没有“共同体”概念及思想作为基础,夏鼐就不会有将“中华民族”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而创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可能。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夏鼐的“共同体”思想抑或“共同体”概念源自何处?新近的一些研究在论及夏鼐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以及这个概念被中国社会科学界、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接受和运用的理论渊源时,多溯及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

① 随着研究的推进,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就目前来看,夏鼐是这个概念的最早使用者。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及其共同体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滕尼斯的著作及学说是否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夏鼐，研究者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据，笔者也尚未发现这样的证据。

目前来看，夏鼐在1962年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理论上主要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后文简称为“经典作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概念及思想的启发。他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强调：“我们要不断地改进考古研究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打好理论基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许多民族都有它们的族源问题和它们的发展的历史面貌问题。考古研究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巨大的作用。”^[5]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强调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考古工作的指导意义。1952年秋，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的一次演讲中援引郭沫若的话指出：“今天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或从事地下的发掘，不掌握马列主义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6]其后，他在论述考古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时进一步强调：“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7]⁶

上述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夏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考古研究和领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夏鼐在考古研究中注重运用中国民族学资料和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考古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必然要学习、研读马列主义著作，而“共同体”概念恰恰“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8]，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被大量使用的概念，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是学者必读、先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延安时期就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高级干部、理论工作者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夏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创建考古事业的担纲者，无疑学习过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地学习过这些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概念及思想对他产生直接影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包含斯大林“民族共同体”概念及思想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也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之际，学界关于民族划分标准的讨论，1954年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1958年至1962年间关于经典作家著作中西文民族词语翻译问题的讨论等，均直接涉及如何科学理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这使得上述斯大林的著作中关于“民族”“民族共同体”的论述在当时被人们广泛引用和讨论。这也使“民族是一种共同体之观念”（后文会详述）在学界扩散开来，“民族共同体”概念开始被历史学者、民族学者较为普遍地作为“民族”的替换概念来使用。例如，1954年，中国民族史学者白寿彝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一文，不但在题

目中直接使用了“民族共同体”概念,且在文章开篇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历史现象的时候,首先必要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而得出科学的具体的论断。对于民族共同体问题,也是同样地处理的。”^[9]在具体分析中,白寿彝将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氏族、部落、部族三类族体,均视为现代民族形成以前的民族共同体^[9]。

此外,受经典作家“共同体”概念及思想,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影响,苏联的民族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也普遍将不同类型、层次的“族体”视为“共同体”的具体形式,或直接将其称为“民族共同体”。195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依据苏联民族学者的8篇论文编译印行的《论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第一辑》一书中,“民族共同体”概念被普遍使用^[10] 180。

中国历史学界、民族学界的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苏联学者的联系比较密切,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对中国民族史、民族学学科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苏联的民族学者对“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包括夏鼐在内的诸多中国学者。这些情况印证了林耀华的判断: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翻译界将经典作家著作中不同的民族词语(即西文民族词语)统一译为“民族”,同时又译为“民族共同体”,从而使“我国通用的‘民族’一词”,开始指“所有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民族共同体两个名称所指的都是同一事物”^[11] 106.100^[12]。

综上所述,夏鼐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应当为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概念及思想,和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学界在“民族”“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内涵上形成的共识。当然,“共同体”概念在中文世界的扩散,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出后逐步被学界、理论界广泛接受和运用,滕尼斯的共同体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也对其发挥了一定的助推作用^[13]。然而,即便是滕尼斯的共同体学说,也“深受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影响”,进而又影响了“后来人对共同体的研究”^[14]。

二、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概念及其思想向度

上文阐述了夏鼐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那么,作为这个新概念主要理论渊源的经典作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理论向度何在,就很有必要阐明了。而这也有助于研究者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何能被中国学界、理论界普遍接受和政治化,以及政治化之后何以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是经典作家阐发民族思想的两个重要概念,后者由前者派生。在经典作家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共同体”概念最频繁,阐发的思想最为宏富、深邃,在中国的影响也最大。他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及其思想的阐发,与他们“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过程具有同构性”^[15]。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本中的“共同体”

一词对应的德文词主要有 Gemeinschaft、Gemeinschaftlich、Gemeinschaftlichkeit 等。不难看出，后两个德文词是 Gemeinschaft 的衍生词。Gemeinschaft 一词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是组织、集体、团体、联盟；二是结合、联合^[16] 46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是使用“共同体”概念较多的著作，仅在1995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中这一概念就出现过39次^[17]。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概念的直接使用，多数情况下都有前缀词或修饰语，如“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原始的共同体”“古典古代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封建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及其思想的阐发是分场景或语境的。但是，他们从未对何为共同体明确下过定义，也即从未明确地对“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作过界定。这表明，人们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不能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还应关注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概念，以及他们使用这个概念时的语境及其暗含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等问题。

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共同体”概念与作为人格存在形式的“个体”概念对立使用的^[8]。他们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8] 119。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所有的共同体都看作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是认为不同形态的共同体对人的自由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为不同。例如，在论述基于阶级统治而存在的共同体——国家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8] 119当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时，人类就走向了“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19] 119。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及其思想的阐发，旨在揭示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或人在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中的发展状态。因而，他们对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共同体的形成、特征及运行机制的分析，都是围绕实现人本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人格“个体”与作为由这种个体自由联合而形成的“真正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8]，构成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互为前提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或形式的共同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出现进程中出现的个体的人基于某种共同性而形成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氏族、农村公社、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种族、民族（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如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国家、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等，均视为共同体的具体形式；一个大的共同体往往还包含着众多不同规模、层次、性质的小共同体。同时，他们还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共同体与未来社会将会出现的共同体，归纳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体，主要

包括:不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天然共同体”或“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关系或阶级分化为基础而形成的“抽象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以私有制、阶级消亡为基础,个人在实现全面自由、全面发展和全面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实质的“真正的共同体”,也即“最高共同体”或“终极共同体”等。有学者据此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们的群体结合方式或集体存在方式或组织形式,而无论它以实体还是关系表现出来,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无论它的规模的大或小,也无论它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些通通都无妨。”^[19]²应当说,这是一个公允之论。换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是人类社会诸多共同体的具体形式之一。

“民族共同体”概念是作为“共同体”的派生概念而出现在经典作家思想体系中的。在经典作家著作的汉译本中,使用过“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расовая общность),也不是部落的(племенная общность)。……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20]³⁰斯大林讲的这个“民族”指现代民族(нация)。但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民族”包含的类型有多种,除了现代民族,即与俄文 нация、英文 nation、德文 Nation 等对应的民族外,还包括与俄文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英文 people、nationality,和德文 Volk、Nationalität 等对应的其他一些民族,涵盖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类民族^[21]。这些不同的族体,都是共同体的具体形态,或民族共同体的不同类型。

在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中,各类民族共同体与他们所说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天然共同体”更接近,与基于阶级统治而存在的“虚假的共同体”则有本质的不同。前现代社会的民族共同体的产生,要早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后才形成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早期的民族现象时就指出:“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22]¹⁴²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以血缘、语言、习俗等原生性社会要素为基础的“部落共同体”是“天然共同体”^[22]¹²³的一种。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各种形式的民族共同体很多时候又是以超阶级的形式存在的,经典作家普遍论及的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而形成的现代民族就属于这种共同体。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讲:“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3]³²

本文所说的思想向度,指一种思想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尺度。沿着经典作家的思想路线观察人类历史上的各类民族共同体及其演进规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均会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但在此之前，它们始终会在总体上以生灭兴衰、分合演进的状态或过渡状态存在、展现自己，并与阶级、国家等其他类型的共同体普遍发生关系。前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基本上均是在原生性社会要素汇聚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型民族共同体——现代民族，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要有原生性社会要素发挥作用外，还要有建构性社会要素发挥作用。对有些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言，建构性社会要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其二，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是完全相通的，而且二者相比较，共同体思想处于上位，也即他们的共同体思想对他们的民族理论是有统摄性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认识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专门理论，其根本的实践指向是在完成阶级革命、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各民族的团结联合，从而为各民族间的自然融合创造条件，为共产主义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积累社会基础，而非使各民族都实现政治自决、相互隔绝、独立发展。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把阶级革命、阶级利益和民族革命、民族利益结合起来，并使民族革命服从于阶级革命，使民族利益服务于阶级利益，进而在实现和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各民族的团结联合统一和多民族共同体建设——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在一国范围之内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积累社会基础的必然选择、神圣使命，也是在一国范围之内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的不二选择。

可以说，以上两点也正是把“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概念结合起来而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夏鼐，和学者们在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及其内在规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时接受、运用这个概念，进而使这个新概念被中国学界、理论界广泛接受和运用，并在新时代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核心概念的直接理论根源和驱动力。质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化及其功能扩展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化指其从学术圈、学术文本中走出，被政治领导人的讲话、署名文章，或官方权威媒体的新闻通稿、社论，或国家政策、法律文件，或官方主编的意识形态教育读本采用，成为政治话语的常用概念。学术领域、社会科学中的某一概念，只有被政治文本、话语采用，尤其是被政治领导人的讲话、署名文章以及国家政策、法律文件同时采用，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动员之中，演变为高度抽象的观念信条，才能说这个概念实现了政治化。

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出于1962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学界传播，进入21世纪前已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和运用，1979年首次被作为国家通讯社、法定新

闻监管机构的新华社使用^①[2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民主党派领导人^②[25] 95 [26] 377-379、《人民日报》等使用^③[27],但其被高度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则是在新时代^[4],标志是在2014年5月之后,这个概念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阐述民族工作主线的关键概念。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公开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28]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直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使用:“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9]⁴¹这个论述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的基本内容之一。以此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性重大论断,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之对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线,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总纲。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从上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是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的基础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被政治化之后,它的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和扩展: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发展为一个在学术、新闻、教育、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等领域同时使用,且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功能的概念。在此之

① 1979年4月23日,新华社在报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的消息时,直接转述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全国首个考古学规划纲要中的一段文字:“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考古学界探讨的主要课题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渊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发展,国内主要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城市和手工业发展的特点等。”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首次被国家权威媒体使用,也是其政治化进程发端的标志性事件。

② 1990年2月,台湾地区政党——中国统一联盟的创立者及首任主席、著名作家陈映真应全国政协之邀率团访问大陆,其间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受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委托)等人的接见。江泽民在接见时强调:“我们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两岸人民都希望统一。”陈映真则回应:“海峡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分享我们民族绵长光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共同承担民族未来的荣辱与兴衰的责任。”陈映真在结束访问离开大陆时发表的声明中,再次重申这一说法。新华社则对此次访问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陈映真包括上述说法的声明。其后不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一书收录了江泽民、陈映真的上述讲话。

③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中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同胞和内地同胞,本是同根生,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

前,这个概念主要被学者们用于探讨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壮大、具有什么样的特质等问题,但在被政治化和成为新时代的基本概念后,它不但继续被学界进一步用于讨论上述问题,还被理论界运用于界定、阐释和宣传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运用于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制订和调整。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准来全面反思和评估现有的民族政策,制订、出台新政策^[30]。“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语义、价值取向与此高度一致。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成为一个既能表述中华民族在自在阶段发展的事实和传统经验,也能表述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自觉、自强阶段发展的事实和成功经验,还能表述中华民族在自为阶段发展和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出口、价值符号。它所蕴含的思想和实践引导动能由此被完全激活,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动能。而其背后深沉的理论动力,显然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持续推进。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思想补充

一般而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概念能“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特定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31] 64-65^[32] 138。“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新时代的基本概念,除了前述原因外,还在于它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而言具有思想内涵上的补充性、价值引导上的超越性。而这是更为关键的一点。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线索、民族工作实践的成效说起。中国把民族平等确立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成为“指导民族事务的宪法原则”^[33] 85和制订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依据这一原则和立场,党和国家组织专门力量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实现政治和社会权利,由此逐步建立起一套涉及面广且内容丰富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套政策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政策的全面展开,这对“改善民族关系”^[34] 48,为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把传统的民族性的地方政权纳入统一的国家制度体系,完成政治统一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相对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党的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心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建设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政策调整的滞后,这些政策及其实践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群体的自觉意识、权利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凸显,从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因素;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这个应当成为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自居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核心地位长期未能真正凸显。有学者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在很长的

一段时期内在“相关的制度设计和理论中存在缺失,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中居然没有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中华民族国家的宪法中却没有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没有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35]。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中华民族”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而言,正如“民族”概念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学、民族理论一样,都无疑应当是核心概念。与此相关,在民族研究领域,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关注的主要是各民族的差异性、特殊性,而非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一致性。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华民族理论的建设是滞后的、薄弱的。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新时代之前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而是强调对以往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践,我们始终要有一种反思性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和立场。任何一项社会实践、一种理论都是基于具体的人而存在的,而人是历史的产物,无法彻底克服自身在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但人的认识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只有不断用进步了的认识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学者提出,要在注重建设以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断团结联合各民族、有效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等为主要目标的民族理论的同时,注重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为目标民族理论,代表性观点当为历史学者范文澜1950年关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倡言^[36]^[37] 168-169。对此,费孝通后来讲,“由于当时缺乏族别研究、地区性综合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基础,对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任务提出来而未能得到推进”^[38] 305。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为此,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既肯定“多元”又肯定“一体”的论断,将“多元”与“一体”这两个包含相悖之义的概念整合在一起。一些学者未能理解“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或有意识地强调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所以,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并要求加强其内部凝聚的论者或力量,抓住其中的‘一体’概念,并以此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主张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各自朝着民族实体方向发展的论者或力量,则抓住‘多元’概念,并以此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于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分’与‘合’之争再次凸显”^[35]。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提出,以及其被官方吸收、运用(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被党的民族理论吸收),尚未完全消解不同论者或力量在中华民族发展方向上的分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政治化,尤其是被塑造为新时代的基本概念之后,则有望最终完全解决上述问题。

其一,相比“中华民族”概念,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中的“民族”和“共同体”语义有重合之处(因为但凡民族,无论属于哪个层次、哪种类别,都是一种共同

体),但“共同体”相比“民族”,是个更上位、更具包容性和共善价值的概念,因而与生俱来地具有某种正向关系、价值的规约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加尾缀“共同体”组合而成,通过在语言表述形式上的同义反复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语义上的强调,这一概念因此有效弥合了“中华民族”和“我国各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之间长期存在的语言表述张力,为承载人们关于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体性民族之思想提供了出口,也为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提供了价值指引。

其二,相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能更为明确地强调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体性才是中华民族的首要特质。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同为“中华民族”的衍生概念、替换概念,但只有通过追加作为尾缀概念的“共同体”,才能把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实体性民族的意涵、价值导向更为清晰、明确地呈现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语义、价值取向既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结构的民族实体的含义表达了出来,也把“一体”对“多元”的统摄之义、“多元”对“一体”的支撑之义凸显了出来。

五、结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概念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被政治化,尤其是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赋予思想、实践引导动能,根本目的在于为人们化解当前的民族问题,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补充完善党以往在民族理论建设中的薄弱之处和缺失,为矫正以往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与实践层面的偏差等提供一个有效的思想工具。具体来讲,在理论层面,就是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阐释何为中华民族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思想出口,作为表述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经验、实践指向的思想出口;在实践层面,就是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的语义、价值取向引导我国当前的民族工作,从而在现有历史条件下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不过,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尤其是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的重构中真正发挥理论基石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39]⁹⁰的深意之一。就此而言,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快推进:

其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理论基石,重构中国民族理论,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这里说的“重构”有两层含义:一是并非要否定中国以往的民族理论,而是要在继承、扬弃已有理论的前提下,以新的理念更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基本框架,完善其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二是并非要否定“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及其理论和实践引导价值,而是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确立为重构中国民族知识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明确

其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两个概念的不同使用语境和功能,形成概念间的互补。

其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立场和价值取向搜集和梳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正确回答中华民族“是什么”等根本问题,并在全体中国人民、中华儿女当中普及相应知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在全社会宣传、普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揭露、反对以“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观”“大汉族主义史观”“狭隘民族主义史观”等为代表的错误的中华民族史观的必然要求。

其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及规律,近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的理论化为着眼点,构建原创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讲话、署名文章,党和国家的法规、政策文本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运用大众话语,总结、提炼原创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理论形态;二是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学理论构建,运用国内外有价值的学术理论、概念、话语,总结、提炼和构建原创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理论形态。这也是“以学术讲政治”^[40],用学术理论助力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四,以上述三点为基础,推进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相关二级学科的知识体系、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及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更新和完善;适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进入国家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党章、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安全法、反国家分裂法等法规和政策文本之中。

参考文献:

- [1] [美] 麦克洛斯基,等. 社会科学的措辞 [M]. 许宝强,等, 编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2] [德] 冯凯. 概念史: 德国的传统 [C] 计秋枫, 译//孙江, 主编. 亚洲概念史研究: 第3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3] [英] 梅尔文·里克特. 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M]. 张智,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4] 杨须爱.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演进史钩沉 [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2 (3).
- [5] 夏鼐. 新中国的考古学 [J]. 红旗, 1962 (17).
- [6] 夏鼐. 田野考古序论——在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演摘录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2 (4).
- [7] 夏鼐. 夏鼐文集: 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8] 侯才. 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 [J]. 哲学研究, 2012 (1).
- [9] 白寿彝.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 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J]. 新建设, 1954 (1).
- [10] 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 编译. 论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 第一辑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研

究部, 1956.

- [11] 林耀华, 主编. 民族学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
- [12] 林耀华. 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 [J]. 历史研究, 1963 (2).
- [13] 刘海涛.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 (1).
- [14] 孔伟. 哲学视域中的共同体理论——兼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 (3).
- [15] 刘伟.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新境界 [N]. 学习时报, 2018-01-03 (2).
- [16] 潘再平, 主编. 新德汉词典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17] 臧峰宇, 赵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概念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2).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9] 秦龙.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
- [20]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M]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 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 斯大林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21] 杨须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 [J]. 民族研究, 2017 (5).
- [2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M]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24] 《新华社新闻稿》编辑部. 新华社新闻稿 [M]. 北京: 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79.
- [25] 新华通讯社中国年鉴编辑部. 中国年鉴 1990 [M]. 北京: 中国年鉴社, 香港: 新中国新闻有限公司, 1990.
- [26]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 [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0.
- [27] 创造性的杰作——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 [N]. 人民日报, 1990-04-07.
- [28] 人民网.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EB/OL]. (2014-05-30) [2022-01-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30/c1024-25083330.html>.
- [29]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增订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9.
- [30] 尤权.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J]. 求是, 2021 (21).
- [31] Hartmut Lehmann, Melvin Richter.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M].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32] 方维规. 什么是概念史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33] 郝时远.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 [34] 黄光学, 主编.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上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35] 周平. 中华民族: 一体化还是多元化? [J]. 政治学研究, 2016 (6).
- [36] 范文澜. 中华民族的发展 [J]. 工作通讯, 1950 (50).
- [37] 范文澜. 范文澜全集: 第10卷(文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38] 费孝通, 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 [3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2.
- [40] 杨光斌.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 [J]. 政治学研究, 2022 (1).

(责任编辑: 杨建军; 专业编辑: 安若飞)

The Main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oliticization Effect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about Community

YANG Xu'ai

Abstract: Concept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ory, the outlet of thought and the “public reference of meaning”. As a new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volved into a basic concept of Chines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new era.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is concept is the resul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about community and ethno-national theory. Politicization has made it develop from a descriptive concept initially used only in the academic field to a descriptive, normative,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concept simultaneously used in the academic, journalistic,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fields. Compared with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concept can not only clearly expres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made up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s a whole, but als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nation-state with a pluralistic unity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dominance of “unity” over “diversity”, and the support of “diversity” to “unity”. The release of the thought and practical guiding power contained in it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it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cept; Marxist Thought about Community; Theoretical Origin; Politicization Effect